

我接触外公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对外公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母亲的叙说和长大后对外公作品的研读。

外公的感情深执强烈细腻,他爱国爱民爱子女爱周围的劳苦大众,以至于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对黑暗势力顽强斗争不掘不挠;对真理的追求,虽颠沛流离,吃尽千辛万苦,却上下求索,至死不悔。

外公好学、博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那怕年老体衰,疾病缠身,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与思考。在七十多岁的那些年,他经常学习的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泽东选集》、《国际问题译丛》、《哲学研究》等等,在工作和学习之余作为调剂头脑时,他还阅读多种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他突发疾病的那天上午,他正在阅读并过朱的是《经济译丛》、《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习仲勋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的总结性发言》等。

外公虚怀若谷,坦荡谦逊。在家庭内务方面,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

一是我父母的婚姻。由外公和张百麟创办的贵州第一个政党——贵州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清代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其与刘显世是不共戴天的政敌。而我的母亲找的夫婿却正是刘显世的侄孙。尽管正是刘显世等人勾结滇军里应外合颠覆了贵州军政府,葬送了贵州辛亥革命,也因此使外公险遭毒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政治流亡生涯,但在我父母的婚姻里没有发生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两位年轻人顺利结为夫

妇。原因是外公没有把自治学社与刘显世的恩怨强加到子女身上,婚姻大事全由子女自己作主。这一点,是历代许多为人父和为人母做不到的。

另一件事是回忆长征沿途所见所感的《西行追忆录》写成后,外公把文稿寄给我的母亲和四姨,要他们各自誊写一份收藏。但在信中他同时写道“你们都是学文学的,你们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眼光,不要当父亲写的东西,只当如朋友或不相识的人写的东西,尽

量地批评,倘若一般水平线都够不上,连抄录收藏都不必……”

正是外公的教诲和影响,我的母亲,一生正直、敬业、博学、谦逊,一

九五八年二月刚开始,那时我已是小学生,清楚地记得,那天,母亲正准备去上课,《贵州日报》到了,头版即刊登了外公去世的消息。随着电报也到了,母亲拿着电报去向学校领导请假,这时,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才知道她是周省长的女儿,此前,母亲从未向任何人谈起自己的父亲是周副省长,是贵州的名人。我想,母亲能这样,是和外公的要求与教育直接分不开的。

最强烈、最深切地打动我的,是外公身上的那种奋斗精神。外公的一生,是不断追求,不断进取,不断奋斗的一生。不管在人生的哪一阶段,包括在八十将近,多种疾病缠身的耄耋之年,他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不断地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审视,在思想上不断地对自己进行改造、整合、更新,正因为这样,他的思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在年已五十七岁的时候,毅然加入红军的行列,随红六军团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

当时,外公是抛家别子,置生死于度外。

不断追求 不断进取 不断奋斗

——追忆外祖父周素园

赵明和

他对因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前来劝说他不要参加长征的人说：“我今年快六十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1936年11月随红军到达同心镇后，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你们的学业半途而废，尤其小的几个，不惟教育没人负责，而且还顾虑许多的意外……只有请你们受苦受难的多多原谅我”。另一信中对他随红军走后考虑家庭的处境他写道：“……则抄捕监杀，种种危险，俱有可能，……只好置之度外”。

“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外公已作好献身国家骨埋青山的准备。他在视为绝笔的家信中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近最后的五分钟，区区家庭及个人之事，实无谈说之必要……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困难则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

外公一直是习惯长衫的，推想他长征时也着长衫，他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队伍中唯一一位着长衫、戴眼镜的民主人士。就这样，在他将自身和舐犊情深的子女一齐置之度外，咬牙忍受千辛万苦，完成长征到达延安的全过程中，在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们的朝夕相处中，外公从思想上完成了他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为一位坚强的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能这样，除了源于他深厚的爱国之心和强烈的报国之志外，与他毕生不断进取，不断奋斗的个性紧密相关。把这种精神放到今天的和平环境中，从对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的角度思考，会得到十分现实的启迪。

中国有“人过三十不学艺”的老话，现在有许多人仍是这样，艺都不学了，技术都不学了，过了三十四十什么都定型了，尤其是过了五十，来日苦短，打着麻将混着日子等退休等老等死吧，哪还有可能在五十多岁以后对自

己的人生道路作出重大的重新选择，哪还有可能让自己在五十多岁以后世界观、人生观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再看国外，发达国家的民族，都有一种共同的奋进精神，他们可以在四十多岁后重修专业，他们也可以在七十岁时从头开始学画，然后在七十九岁开出成就斐然的画展……这种积极进取与勤奋不辍的人生态度与外公的那种奋斗精神是“异国同工”，我觉得在今天来提倡和学习这种精神显得尤其重要。

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轨变型时期，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天天兴旺发达，改革开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社会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现代人面临的新课题概括地说就是如何既继承传统又接受新的事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有人在彷徨，也有人沉沦。那么，如何分析、认识、适应当前的变革，如何把握时代的主潮流主旋律，如何找准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身的定位，从而为富强中华，为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自身的力量，我想，对于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外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抗战爆发前，外公离开延安时，毛主席给了他一封亲笔信，信中有一句话是“……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位奋斗的人”。我觉得，奋斗二字是对外公人格最精炼的概括。纵观外公的一生，无论是他对真理的求索，对学习与思考的不倦，对自己不断地整合、更新，还有他对疾病和衰老的抗争，无一不是一种奋斗。奋斗精神贯穿了外公的一生。

作为周素园的后代，我想，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前提，让自己的血液里永远涌动着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对外公最好的纪念。

（赵明和 贵州财经学院）
责任编辑 王羊勺